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美国文化的新边疆

刘国柱 著



美国文化的新边疆

胡晓军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美国文化的新边疆
——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

刘国柱 著
导师 王晓德
审稿 李茂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 / 刘国柱著 .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5174-1

I. 美… II. 刘… III. “和平队”(美国)-研究
IV. D8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2632 号

责任编辑 易小放

特约编辑 何 力

责任校对 徐 霞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010 - 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嘉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刘国柱 1965 年生，河北辛集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导师为王晓德教授）。现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合作导师为朱瀛泉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校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在《世界历史》、《世界经济与政治》、《史学理论研究》、《南开学报》、《历史档案》、《史学月刊》、《历史教学》等国内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 20 篇，合著有《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一书。目前正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美国对外关系史”（六卷本）第二分册——“内战后至一战前的美国对外关系”；参与南京大学 985 二期工程——“全球化与国际关系”项目研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和平队的学术专著。作者探讨了和平队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平队与冷战、与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战略的关系；第三世界国家、冷战对手及美国盟国对和平队的反应；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各项工作；和平队面临的问题及政策调整；和平队的功能与作用。本书将和平队视为美国文化的产物、美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考察了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分析了和平队志愿者作为文化使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作者对冷战结束后和平队的历史走势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汝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编辑：李茂生

学术秘书：冯广裕

本书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总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 12 年。这 12 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泽厚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1999年8月，笔者在美国首府华盛顿访问时住在一对美国夫妇家里，主人热情好客，每年都自愿无偿地接待一些来访的外国客人。闲谈之中得知，他们是第一批和平队队员，当时响应肯尼迪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号召，在一种“理想主义”动机的促动下离开了美国，先后到过菲律宾、印度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最长，直到子女长大后才回国定居。他们对把青春年华在异国他乡度过丝毫无后悔之意，对东道国文化的眷恋，不时地把他们的记忆带回到往日艰难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异国生活。我的研究领域一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对和平队略有所知，但谈不上深入。与他们的谈话使我即刻萌生了研究和平队的想法，一方面把和平队作为战后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个案来研究，另一方面探讨和平队队员自愿到世界落后地区工作的社会文化根源。回国后，尽管杂事和其他研究课题缠身，但我并没有放弃这一研究计划。在一次博士生选题讨论课上，我谈到了研究和平队的重要性。刘国柱当场表示愿意把和平队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经过四年的努力，这篇关于和平队的博士论文终于完成，并有幸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确值得祝贺，也算了却了我本人昔日的一个愿望。

对和平队的研究，美国学界几乎与这一机构开始展开活动同步，出版了大量的论著。据我所知，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

两本专著代表了当今美国学界研究和平队的水平。一本是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的《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爱：和平队与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霍夫曼认为，和平队的创建不只是肯尼迪的动机，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要求。这一机构的建立恢复了美国人无私的价值观，展示出人类共同观念与进步的实现，超越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本书出版之后得到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好评，霍夫曼也被美国一些老一辈学者称为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另一本是弗里茨·费希尔的《使他们像我们：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队志愿者》，这是作者在其西北大学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费希尔把研究的眼光集中到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上，认为这些志愿者在海外的活动促进了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对话与文化互动。然而，当这些志愿者试图使“他们像我们”时却在文化上陷入了一种两难之境，即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美国文化与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对这种两难之境的考察构成了全书的主题。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美国学界对和平队的研究开始走出过去的冷战范式，为人们重新审视这一机构的活动和演变提供了新的角度。我国学术界对和平队的研究几乎为零，在这一研究课题上根本谈不上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或对话。因此，刘国柱的博士论文尽管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探讨，但作为国内学术界第一本研究和平队的专著，其学术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一向重视在落后国家的文化输出活动，总是试图利用自己所谓“优越”的政治文化来实现一统天下的长远目标。不过在历史上，美国政府似乎不大重视由官方发起的文化交流活动，这样的活动主要由教会、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来承担。所以，美国联邦政府长期不设文化部，甚至美国国务院在1938年设立文化关系司时，许多政府官员仍然对把文化当做一种外交工具表现

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全改观，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企业或机构，都认识到美国文化有利于实现美国在国外的现实利益，尤其是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抗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在战后发起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外交活动，它出现在美苏冷战高潮时期绝非偶然。肯尼迪这位属于“冷战一代”的总统雄心勃勃，大有以美国的自由体制征服世界之势。肯尼迪把其政府奉行的外交政策形容为“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在第三世界大力促进所谓的“民主”，以图改变美国战后支持独裁政权的不佳形象。组建和平队便是“橄榄枝”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平队以文化“使者”的身份活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传统的强权外交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其实，在服务于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上，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着相同的目的。因此，无论世界局势发生了多大变化，和平队“始终是围绕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作者的这一结论尽管指后冷战时期和平队的发展趋势，但作为一个基本观点却贯穿于全书之中。

和平队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宣布该机构具有三大目标：一是“帮助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满足对训练有素的男女之需要”；二是“帮助促进美国人民对所服务国家人民更好的了解”；三是“帮助促进其他国家人民对美国人民更好的了解”。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些也许是冠冕堂皇之词，但就报名参加和平队的志愿者而言，至少后两个目标成为他们走出国门的主要动力。他们以自己的“善举”把一种新的文化带到了东道国，使当地人看到了体现在这些志愿者身上的文化积极成分，这无疑有助于当地人对美国文化的了解。派出和平队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单向行为，但在文化交流上，和平队却显现出双向的效果。这些志愿者一般生活在东道国社会的基层，他们在向当地人介绍美国文化的同时也在

不断深入接触当地社会，他们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尽管往往伴随着“文化震荡”，但却是亲身体验，铭记终生。他们服务期满回国后，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介绍所服务国家文化的使者，有些人把自己的经历记录成书出版，多以积极的文字把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展现在国人面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向具有文化优越感的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因此，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批评和平队为“文化渗透”的工具，显然远不能有助于对和平队研究的深入。作者的研究走出了这一误区，以具体的案例和统计数字展现了这些志愿者在文化交流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的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和平队自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 40 余年的春秋，这一机构在冷战时期的发展尽管不是一帆风顺，但当美国政府现在回过头来看冷战的历史时，作为美国对外关系上的“软力量”资源，和平队所起的作用显然是“硬力量”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和平队在后冷战时代呈现出扩大之势并非出乎预料之外。克林顿提出把和平队志愿者的人数增加到万人，小布什在 2002 年致国会的咨文中宣称在未来五年内将和平队志愿者的人数翻一番。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克里也表示对和平队事业的支持。凡此种种均表明美国政府再也不可能忽视和平队在海外所起的重要作用。2004 年 10 月 15 日，和平队第 16 任队长加迪·瓦斯克斯（Gaddi Vasquez）应邀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了题为《和平队：促进 21 世纪的和平与友谊》的演讲（笔者有幸参加）。瓦斯克斯在演讲中很少涉及和平队与美外交的关系，只是强调和平队志愿者服务世界的无私精神与奉献。这里，笔者不想对瓦斯克斯的演讲内容作过多的评价，但听了他的演讲之后更加感到，不管是对美国政府外交战略的实现，还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平队都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对和平队的研究应该跟上时代的需要。刘国柱博士论文的出版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在和平

队研究上的不足，但显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我衷心希望这部专著能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地认识和平队，也希望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课题上能有更多专深的论著问世。

王晓德

2004年10月于哈佛大学